

中 | 华 | 经 | 典 | 名 | 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诗 经

刘毓庆 李蹊 译注

【上】

国 风

中华书局



中华
经典
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刘毓庆 李蹊〇译注

诗 经

国 风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刘毓庆,李蹊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1.3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7738 - 4

I. 诗… II. 刘… III. ①古体诗 - 中国 -
春秋时代②诗经 - 译文③诗经 - 注释 IV. I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4099 号

书 名 诗 经(全二册)

译 注 者 刘毓庆 李 蹤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 任 编 辑 宋凤娣

出 版 发 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29 1/2 字数 650 千字

印 数 1 - 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738 - 4

定 价 54.00 元



前　言

一　关于《诗经》的性质及其结集问题

阅读或研究《诗经》，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诗经》是一部什么书”。今天，无论哪一部文学史，都会明确地告诉你，《诗经》是周代的一部诗歌总集。并且告诉你，只有以文学的眼光来研究《诗经》，《诗经》才算是恢复了其本来面目。但是要知道，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诗经》却是以“经”的绝对权威存在于中国历史的。她的经学意义要远大于她的文学意义，她对中国文化史的巨大影响主要在“经”而不在“诗”。如果我们简单的仅仅以“文学”来对待，她的文化意义必然要受到巨大损伤。因而我们必然面对历史与现实，对她作出客观的分析、认识与重估。

就从《诗经》的产生而言，虽然她的每一篇其本质都是文学的，然而她的结集，她的权威性与神圣性的出现，她的广泛影响，却是与周代礼乐制度密切联系着的。她不仅表现了周代礼乐制度笼罩下的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表现了礼乐文明即“周代理性精神”激荡下人们的种种思考和心灵感受，同时她是作为礼乐文明的一部分而产生、而存在的，她的各篇诗歌，都是配合着“周礼”而演唱或演奏的。在什么样的场合演奏什么样的诗，这是不能含糊的。在大学，作为学习《诗经》的一般知识必须要知道的是：“《诗经》收录了自商末（或说周初）到春秋中叶的诗歌

305 篇，存目 311 篇，其中六篇有目无辞。共分风、雅、颂三部。其中《风》诗分《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十五国风，有诗 160 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 105 篇。《颂》分《周》、《鲁》、《商》三颂，有诗 40 篇。《诗经》诗篇所产生的地域，大略在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及湖北、安徽北部等地。其作者成分很复杂，有民间歌手，也有文人之作；作者的身份有帝王和朝廷重臣，也有宦官、走卒和农夫、农妇。然而时间跨度如此之长，地域分布如此之广，在人类物质财富尚不发达、靠竹简艰难地记录语言的时代（在当时抄录一部《诗经》所耗财力、人力，必然是很大的），如果不是礼乐制度的需要，不是出于政治功利目的，我们很难想象，有人会为一部“纯文学”的集子、为简单的情感抒泄，去耗费大量人力、财力进行一项对国计民生没有意义的工程的。因而我们说，《诗经》一开始就不是作为文学启动的。

据有关史料记载和古今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诗经》的结集过程：周代有“采诗”之制：每年在固定的时间内，有专人到各地采集歌谣，集中上报到周王朝中央管理音乐的官员那里，经过王朝乐师的整理（乐谱和歌词大约都有修改），再献给天子，目的是为了“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这部分诗大部分在《国风》中。另外的《雅》诗有许多为朝廷官员的“献诗”，即《国语·周语上》所说的：“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至于编辑过程，大约有三次，第一次编辑当在周宣王时，第二次当在平王东迁后，第三次是孔子最后整理编定（参见刘毓庆、郭万金《诗经结集历程之研究》，文艺研究 2005 年第 5 期）。这三次编辑的时间相去甚远，但编辑的主导思想都是为了“崇礼乐”，稳定政治统治与社会生活。特别是孔子编诗，其意义更为巨大。

《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即华夏传统文化最可靠的载体。而春秋时代礼乐崩坏，四夷交侵，使这一文化面临空前危机。孔子编《诗》实际上承担着两项文化使命，一是“文化复兴”，二是“文化承传”。他通过删述

《诗》、《书》，建立起了中国经典文化体系和文化学统，使得中国文化万代相传。无论哪个民族，要想入主中国，首先必须接受这个经典文化体系。“能行中国之道”，方有资格“为中国之主”。而一旦其行了“中国之道”，其民族便会部分的失去“自我”，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中华文化历经劫难而不灭，奥秘正于此。因此可以说，没有《诗》、《书》经典文化体系与文化学统，就没有今日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没有中华民族。

《诗经》有如此巨大的意义，岂是“诗歌总集”所能承载！

二 历代《诗经》研究情况述略

关于《诗经》的研究，其主流也是“经”的研究，这从《诗经》结集的那个年代就开始了。我们可以简单地划为七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先秦，这是“诗经学”的发生时期，此时出现了从训诂角度研究的《尔雅》与阐发诗义的《诗传》（见《荀子》引），而最重要的则是今天所见到的《毛诗序》。20世纪《诗》学界普遍认为《毛诗序》是汉代人的作品，而近些年由于地下出土的文献旁证，许多学者倾向于《毛诗序》为先秦旧籍说。《毛诗序》提出了不少重大课题，成为后来《诗经》研究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风”、“赋”、“比”、“兴”、“雅”、“颂”“六义”的问题，这成了研究《诗经》需要了解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现在一般都采用孔颖达和朱熹的说法，即“三体三用”说。“三体”指“风”、“雅”、“颂”三种诗歌体裁，就是《诗经》中所分的三大类。读者可阅读本书各部分的说明，此处不作赘述。“三用”指“赋”、“比”、“兴”三种创作方法。从字面上理解，“赋”铺陈其事而直述之，“比”是比喻，“兴”是托物起兴。但在具体诗篇的理解中，是属比还是兴，各家就见仁见智了。

第二时期是两汉，这是“诗经学”的确立与鼎盛时期。这个时期传诗者主要有齐、韩、鲁、毛四家，前三家在汉武帝时即被立于学官，介入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建造，属于今文学派，毛诗因后出，未能立于学官，长

期在民间传播。四家《诗》的学者共同努力,将《诗经》经典化、神圣化、政治化、历史化,创造了一个经学的时代。各家都有不少著述,而今传于世的只有毛亨、毛苌所撰的《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与郑玄为《毛传》所作的《毛诗传笺》(简称《郑笺》),今传世的《毛诗传笺》也就包括了《毛传》和《郑笺》,这被学者们认作是“诗经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第三个时期是魏晋至唐,这是个经学中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诗经学”,很少创造,惟有诠释旧注。这时最流行也最权威的《诗》著作就是《毛传》与《郑笺》。许多人在到底毛、郑谁更准确地把握住了“毛诗”的精神问题上争辩。出现了《毛诗驳议》、《毛诗问难》、《毛诗笺传是非》、《毛诗异同评》等之类的著作名目。到唐由孔颖达奉敕编撰的《毛诗正义》(又称《毛诗注疏》,简称《孔疏》)产生,这才调停了纷争。这部书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最高成就。但严格地说,《毛诗正义》不是在注“经”,而是对“经”之注(即《毛传》和《郑笺》)的阐释。

第四个时期是中唐以后至宋、元,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是《毛诗序》被怀疑,经学开始向义理化方向转移。从中唐韩愈即开始“疑序”,经宋欧阳修、苏辙等,到郑樵、王质等发展到顶峰,将《诗序》彻底否定。朱熹《诗经集传》(简称《诗集传》或《朱传》)则在宋儒研究的基础上,以平和之气,弃序不用,就诗论诗,酌采毛、郑,以意逆志,多得风人之旨,代表了宋代“诗经学”的最高成就。其后南宋与元代的《诗经》学,其实多数是对朱熹诗学的诠释和发挥。不过与魏晋隋唐人用“字释句解”的方式诠释《毛诗传笺》者不同,宋元人诠释“朱传”,主要是从义理上阐发,从整体上把握它的意义。

第五个时期是明代。明代从整体上看也是一个“述朱”的时代,但到明代后期发生很大的变化,此时“诗经学”最大的特点是,用文学的眼光研究读《诗经》,产生了一批《诗经》文学研究的著作,最有代表性的是孙钦的《批评诗经》、徐光启的《诗经六帖讲意》、戴君恩的《读风臆评》等。这一批著作的出现,开辟了《诗经》学新的研究方向。

第六个时期是清代，这是《诗经》考据学的鼎盛时代。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诗传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以及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樾《群经平议》等一批训诂与考据的著作。为此后“诗经学”的健康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他们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文字训诂方面的成果，至今仍被大量采用。

第七个时期是 20 世纪，这是现代“诗经学”生成的时代。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点是：抛弃了以往“经”的观念，把《诗经》纯作为古代文化遗产来对待，从文学、历史、哲学、民俗、语言、文化学等多个角度，对《诗经》展开了研究，并且由传统单一的经注模式，转向了纵横论辩的论著模式。像顾颉刚、郭沫若、闻一多、郑振铎等一批大家，都曾以摧枯拉朽之势，给旧《诗》学以颠覆性的冲击，并以崭新的观点，启迪着一代学人。这个时代最大的贡献，被学者称作是：揭去了旧经学堆积的层层“瓦砾”，还《诗》以本来的面貌。

然而《诗经》的研究，是否确如 20 世纪学者所认为，是“今是而昨非”呢？

三 20 世纪《诗经》研究的偏失

确实，20 世纪在一批优秀学者的努力下，《诗经》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综合研究与深入探讨问题的论著，超出了以往的任何时代。但同时《诗经》研究也出现了偏失。

第一个偏失是，否定了《诗经》之为“经”，也彻底否定了“旧经学”，但自己却掉进了“新经学”的泥淖。就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而言，几乎没有一个文化人不诵读《诗经》的。面对《诗经》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种是通过学习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一种是研究其中所蕴有的意义。后者的行为产生了大批可供后人继续研究的思想性、学术性著作，是属于经学的。而前者，则或见诸于行为表现，或形之于诗文与艺术创

作，是属于文学的。但即使对诗文及艺术创作的影响，大半也是因为她作为“经”的绝高地位所致。即如鲁迅所说：假如现在有人写出“关关雎鸠”那样的诗去投稿，定会被编辑扔进纸篓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也就是说，无论用哪一种方式阅读、接受《诗经》，都无法摆脱《诗经》作为“经”的巨大影响，她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已融化于传统中国人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创作、行为表现之中。每个时代的人对《诗经》的理解、阐释、接受，都体现着每一个时代文化主流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20世纪的《诗经》研究者声称颠覆传统、开辟了《诗经》研究的新时代。但请想一想：在20世纪前半叶，“个性解放”的呼声高涨之际，学者们一时把目光放到了《诗经》中的两性关系的表现上，发掘出了一批所谓赤裸裸的表现性生活与感受的作品，以此而高扬性的合理性，从而使《诗经》“婚恋”诗的研究成为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成果。五、六十年代在“阶级斗争”理论风靡一时之际，《诗经》于是变成了最早体现“阶级斗争”的教材。八、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热兴起，《诗经》于是又成了文化的百科全书。难道这种从《诗经》中为现行社会思潮或政治行为寻找理论根据的研究方法，不正是“经学”的新形态吗？

第二个偏失是，既然把《诗经》认作是纯文学作品，于是便用20世纪的文学观念来研究《诗经》。而20世纪从西方引进的某种“统一”的文学观念，将文学的价值认定在了“反映生活”上，于是《诗经》研究者便配合社会的政治与文化思潮，来研究《诗经》中的婚恋生活、妇女生活、阶级斗争生活，甚至从《诗经》中寻找“奴隶社会”或“农民起义”的影子。把一部《诗经》认作了是周代社会生活的镜子，不但否定了《诗经》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也忽略了其作为文学展示人类心灵世界的意义。

简单地说，如果本着20世纪的《诗》学观念与思路继续前行，其结果：第一、可能会把大批前人的《诗》学著作认作是“思想垃圾”而予以抛弃；第二、可能会将《诗经》的文学研究认作是本体研究，而将其他研究视为另类或“前文学”研究；第三、可能会把《诗经》与后世的诗文小说放

在同一个平台上，在“进化论”思想的支配下，视其为幼稚之物；第四、可能会将《诗经》的意义局限在文学的领域，而将研究《诗经》的意义局限在“文学史”的描述上；第五、可能会把《诗经》的阅读简单地理解为学习知识、了解历史或文学欣赏。这样，《诗经》完全可以不与当代人生发生关系，将《诗经》封存起来，也不过是在现代人的视野中删除了305篇古老而失去生机的诗歌而已。笔者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也正是这样，如现在除几部清人的考据著作之外，大量《诗》著被尘封已久；《诗经》被划归于中文系的课目，而历史、哲学等系则鲜去问津；《诗经》因古老而可读性衰减，有学者主张用《红楼梦》取而代之等等，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四 《诗经》学习、研究的新思路

我们必须接受20世纪《诗》学的经验与教训，调整我们的学习、研究思路。把关注点集中在对《诗经》当代意义的追寻上。

《诗经》的当代意义与其历史意义一样，最主要的还在于她的“经”的地位。尽管《诗经》的本质是文学的，她固然是天生丽质，但她要不是乘坐“经”的“圣驾”，浩浩荡荡地穿行于历史的城镇村乡之中，怎能博得万千之众的“围观”与“喝彩”？怎能产生巨大的历史影响？《诗经》的基本素质虽是“文学”的，而她的文化血统、她的地位身份则是“经”的。“诗”是她自身所具有的，“经”则是社会、历史赋予她的殊荣。如果曾经是“皇帝”，即使被打倒，在经济和政治权利上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在世人的心目中他仍然不是普通人，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普通人。《诗经》就是如此。因而对于《诗经》的学习与研究，应该同时从“诗”与“经”两个方面进行。

析而言之，从“经”的角度考虑，我们不但要面对作为“元典”的《诗经》，还要正确对待历代由《诗》而产生的大量阐释性著作。要看到《诗经》与每个时代人的精神生活的联系，及其与每个时代思想文化变迁的

联系，与整个中华民族思维、心理、气质、精神、性格等形成的联系。要把《诗经》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来认识、理解和接受。

从根本上说，《诗经》是周代礼乐文明制度的载体。“礼”包括人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尊卑秩序以及礼仪规矩等等。人的嗜欲好恶，都由礼来节制。“乐”是指音乐。“礼”负责规范人的行为，“乐”则负责调和人的性情，人的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通过乐来表达，同时也可以在乐声中得到“中和”。所以古人说：“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礼乐”的目的在于教化、诱导人向善，让社会处于“和谐”状态。孔子一生奔波，所追求的目标就是“礼乐制度”的实现，即人类对“社会和谐”的永恒追求成为现实。孔子编《诗》，提倡《诗》教，目的多半也在此。后儒秉承孔子之志，将礼乐文明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融入了《诗经》的诠释之中。古代文人群体“皓首穷经”的耐性，犹如成千上万只蜜蜂构筑巢穴那样，在意识形态领域，构筑起了礼乐文明的金字塔，并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诗学阐释中，不断丰富着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文化思想体系，这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有力地规定着黄河、长江流域这个人类族群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可以说，不读历代的《诗》学著作，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什么是“汉文化”。如果我们自作聪明，对旧《诗》学予以彻底否定，那否定掉的可能不只是一个诠释观点，而是一种文化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最为特异之处就在于它“贵义贱利”，不为物欲所动，志在完善人格，构建和谐，为万世开太平。尽管《诗经》所代表的“礼乐文明”，二千年来只作为儒家的一种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存在于观念形态与文化精神之中，但对遏制“物欲膨胀、道德滑坡”始终起着“制衡”的巨大作用，以致保持了二千多年来东方世界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和谐与稳定。比之二、三百年即把地球折腾得乌烟瘴气的“拜金主义”文化来，难道这种文化思想不是当今世界更为需要的吗？《诗经》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的当代意义，不正在此吗？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诗经》最少有三个层面的东西,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第一是语言的层面,即形式表现的层面。大量关于《诗经》语言艺术与语言风格的论著,以及关于《诗经》复叠形式的研究,都是在这个层面上努力的。而且《诗经》作为一种与自然的韵律相合无间的语言,其所具有的魅力,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与效法的。第二是生活的层面,即在内容层面上作者着力展开的生活世界。在这个层面上,《诗经》像一幅周代社会的画卷,其丰富性与多彩性,最为20世纪的研究者所关注。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礼乐文明制度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并从那个时代人的苦乐忧喜中,感受到文学对于生活的“保鲜”处理。不仅可以从中获取种种知识,获得快感,而且还可以获取许多创作的启示。第三是心灵的层面,这个层面包括了内在于人的一切。这是《诗经》作为文学最主要的一个方面,“语方”所构筑的是“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的素材所构筑出的则是心灵图像。内在心灵支配着人的外在表现,人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心灵的外向化。在《诗经》所描述的“生活世界”背后,隐存着一个无限深广的心灵世界,这个时代人的情感、思想、意识、精神、思维、性格、心理、良知等诸多方面,都在这个世界中展开。人类的生活形式在不断变化,有可能会面貌全非,而人心、人情却相去不远,因而在这个层面上,《诗经》所具有的那种情感力量与道德信念,最能唤醒人们珍视然而沉睡或迷乱的内心世界。而且《诗经》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与当代人生发生了关系,我们可以由此而进入《诗经》的情感世界,与那里的人进行对话、交流,同时在那里发现我们昨天的影子,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这个层面上,明清学者留意者尚多,到20世纪,反被那个具有特定政治内涵的所谓“反映生活”、“反映现实”的文学观念,遮挡了人们的视野,影响了人们在这个领域的探索。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研究《诗经》应该特别注意的。

总之,我们今天学习、研究《诗经》,绝不能忽略其作为“经”对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影响,以及其所创造的文化对于当代人类的意义。作

为“经”，我们要看到社会与历史赋予她的“深厚”与“博大”，以及其在铸造民族礼乐文化精神中的煌煌功绩；作为“诗”，则要看到她的“鲜活”与“灵动”，感受先民心灵深处的声音——倘若追问中华民族：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将向何处去？理解《诗经》作为经学的传统历程、感受《诗经》作为文学的无限魅力，也许就是开启这个终极关怀之门的一把有效的钥匙。

我们所作的这本“译注”，并不能满足读者这方面的要求，只是我们尽量广泛地采纳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诗的文本上用了较多的力，对于“经”的方面也尽可能的有所关照，以望对读者有所启迪。

五 历代《诗经》的重要著述简介

由于《诗经》的经学地位，历代有关《诗经》的著述真正是浩如烟海（详见中华书局出版的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和学苑出版社出版、刘毓庆主编的《诗义稽考》），其中各个历史时期最重要的著作前面已经提到一些，这里稍微扩大范围，对其版本、内容和作者略作介绍，以便于初学《诗经》的读者对古代《诗经》研究文献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孔颖达《毛诗正义》（或称《毛诗注疏》）四十卷。孔颖达，隋唐大儒，字仲达，冀州衡水人。曾从同郡名儒刘焯问疑。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武德九年（626），擢授国子博士。贞观初，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贞观六年（632）除国子司业，迁太子右庶子，与魏徵成《隋史》，加位散骑常侍。贞观十一年（637），又与当时一些著名学者（“朝贤”）修定《五礼》，进爵为子。十二年（638），拜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官。贞观十六年（643）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后更名《五经正义》。贞观二十二年（648）卒，陪葬昭陵，赠太常卿，谥曰宪。永徽四年（653），高宗颁诏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其主要贡献是：第一次统一了魏晋以后各种手抄本《诗经》文本的文字，综合二刘的研究成果，对简略

的《毛传》和《郑笺》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并对毛、郑的矛盾处作了调停，尤其是对《诗经》文本中所保存的珍贵的周代礼乐制度，参照《三礼》作了详细的梳理和说明，开掘了《诗经》作为经学深厚的文化土壤；第一次从文章学的角度明确提出“诗六义”的“三体三用”说和《诗经》的“文势”问题，并且第一次从语言学的角度在分析同义复合词、联绵词（连语）时提出“对文”与“散文”的观念（刘勰的“散文”既不是语言学的概念，也不是文体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动词），显然是从唐以前的文章中大量“对举”用语和大量骈文对偶的语言现象中抽绎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后来引申发展成为文体的概念。《孔疏》还引用了大量后来已经失传的中古《诗经》学著作，如刘桢、王肃、宋衷、孙毓、李巡、沈重等众多学者的著述资料。

苏辙《诗集传》二十卷。苏辙，宋代著名文学家、学者。苏轼之弟，字子由，年十九登进士第。仕途坎坷，以大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政和二年（1112）卒，年七十四。著《诗集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等。他认为《诗》之小序非一人之作，疑为毛公之学、卫宏之所集录，所以他的《集传》只取《小序》第一句。解释《毛传》简洁明了，是北宋《诗》学的代表性著作。

严粲《诗緝》三十六卷。严粲，字坦叔，宋邵武人，官清湘令。其书以吕祖谦《读诗记》为主，采集诸说，以发明己意。四库馆臣以为“皆深得诗人本意，至于音训疑似、名物异同考证，尤为精核”。

朱熹《诗经集传》（亦称《诗集传》）八卷。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南宋儒学宗主，承续张载学说，成为理学大师。《诗集传》总结宋研究成果，废弃《小序》，另辟蹊径，重新审定诗旨。从此，说《诗》者遂分攻序、宗序两家。其书平易通达，渗透着强烈的理学精神，把《诗经》的诠释纳入理学系统。书中关于“赋比兴”的定义，贯穿于对每首诗的解读，影响至今。朱熹的《诗集传》可谓“诗经学”发展历程的一大转折。

孙钦《批评诗经》四卷。孙钦，字文融，号月峰，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批评诗经》，是《孙月峰评经》十六卷中的一种，是明代“评点”风气的产物，以“标举其字句之法”（《四库提要》），圈点词语，突出《诗经》的艺术特点。

徐光启的《诗经六帖讲意》。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事迹具《明史》本传）。其书虽照例有字词解读、名物考证之类内容，但讲究章法、句法的前后呼应、赋比兴的因、应规律，显然已经打破传统说《诗》多求义理的格局，许多探求艺术特点的解说，不独有助于文学特点的发掘，对《诗经》经义的理解也独具体会。

戴君恩的《读风臆评》一卷。戴君恩，字仲甫，明代澧州人。万历癸丑进士，官巴县知县。其书专取《国风》加以评语，没有多少阐释经义的文字，专门致力于发掘《诗经》的文学艺术蕴藏。其意颇新，故明闵齐伋感叹此书说：“独是千载陈言，一朝新彻，乃大奇耳。”原本一卷，清代陈继揆加补评，称《读风臆补》，分上下二卷。

胡承珙《毛诗后笺》三十卷。胡承珙，字景孟，号墨庄，安徽泾县人，嘉庆六年（1801）进士，官至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加按察使。其书专意阐释《毛传》，据马瑞辰序称：“其书主于申述毛义，自注疏而外，于唐宋元诸儒之说，有与《毛传》相发明者，无不广征博引，而于名物训诂及毛于三家诗文有异同类，皆剖析精微，折中至当……实集《毛诗》之大成。并录其书之精核，可悬诸国门者百数十条，将以补入余书，示服膺之笃。”可见其书之梗概。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马瑞辰，字元伯，一字献生，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五年（1810）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都水司员外郎等职，坐事遭贬谪。后历任江西白鹿洞、山东峄山、安徽庐山等书院讲习。咸丰十三年（1863）为太平军所杀。《毛诗传笺通释》历时十六年始得完成，道光十五年（1835）刊行。书以“传笺通释”为名，实则即不从“传”，也不从“笺”，而是以“传”、“笺”为对象，凡“传”、“笺”是而后儒

说非者，则申而明；凡“传”、“笺”非者，则明辨之。一切从考据出发，以事实为依据，在学术观点上不依偎于任何一家，把清儒因声求意、因形辨字方面的手段发挥到了极致。此书释《诗》不录全经，而是专将有问题的诗句摘出，先列《毛传》，次列《郑笺》，然后再出按语，以辨是非。作者精通文字训诂之学，并谙究文献典籍，且不隅于一家之说，故而解惑释难，得心应手，每能振聋发聩。

陈奂《诗毛氏传疏》三十卷。陈奂，字硕甫，号师竹，晚号南园老人，江苏长洲人。曾师从江沅、段玉裁治小学、经学，复与王念孙、王引之、郝懿行、胡培翬等朴学大家交游，故其学问日进，遂成《诗》学大家。关于《诗经》的书，他著有《毛诗音》、《毛诗说》、《毛诗传义类》、《郑氏笺考徵》、《毛诗九穀考》等。而使其名世的主要是他的《诗毛氏传疏》。陈奂毕生献身于学术，花费十八年之工力专攻《毛诗》，因此他的《诗毛氏传疏》用功之勤，世罕其比。此书不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那样只抓问题，而是疏解全经及全部《毛传》。对于《毛传》中所有的脱误及衍文，皆一一纠正；对于《毛传》所释，则必一一给予疏解；对于《毛传》未加解释的地方，也要进一步诠释。凡《毛传》与经文中涉及的每一字、每一物、每一事及每一制度与事件，必一一诠释。不过他没有马瑞辰的通脱，而是坚守《诗序》、《毛传》旧说，力为申辨阐发，揭其蕴义。郑玄的《诗笺》，兼采三家，这使他感到不能满意，故弃而不取。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王先谦，字益吾，晚号葵园，湖南长沙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国子祭酒、江苏学政。四十七岁后弃官告归，专心学术。经史子集，皆有撰述。《诗三家义集疏》是研究齐、韩、鲁三家诗集大成的著作。齐、韩、鲁三家诗在汉代盛行一时，东汉之后逐渐衰落，走向消亡。宋代以后，三家诗逐渐为世所注意，开始出现了三家《诗》辑佚的著作。到清代考据学兴起，搜辑三家《诗》佚文、遗说的工作也随之而兴。王先谦因是清末人，因此有机会总结从宋到清的研究成果，加之他学问广博，精通文献及文字训

诂之学，故而使其成就越诸家而上之。用他的话说：“余研核全经，参汇众说，于三家旧义采而集之，窃附己意，为之贯通。近世治《传笺》之学者，亦加择取，期于破除墨守，畅通经旨。”堪称《诗》学史上的扛鼎之作。

方玉润《诗经原始》十八卷。方玉润，字友石，号鸿濛子，原籍四川，祖上徙居云南宝宁。应试二十五次均不第。咸丰五年（1855）投笔从戎，同治三年（1864）以军功铨选陇西州同。至任所后寄居州治，著书讲学。有著作十余种，《诗经原始》即其一。清代《诗》学其大者约分两派，一是汉学派，一是宋派。汉学一派以汉儒之说——特别是《毛序》、《毛传》说为宗，侧重于训诂考据，往往是结合先师传闻与经典文字，疏通经义。宋学一派其实是尊朱派，主张废弃《诗序》，从《诗经》文本出发，探究诗之本义，阐发其义理。清初姚际恒著《诗经通论》，则能不受毛、朱影响，独立成家，则对《诗经》颇多文学性阐发，故被后人称作独立于汉、宋两家之外的一家《诗》学。方玉润得到姚氏《诗经通论》之后，颇多启发。但又觉其“剖析未精，立论未允，识力微浅，义少辩多，亦不足以针肓而起废”。故而“不顾《序》，不顾《传》（指《朱传》），不顾《论》（即姚氏书），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从诗之文本出发，探求诗原初的意义，因此其书曰“原始”。此书现备受当代学者重视，其原因，主要是其从文学角度对《诗经》作出的领会与分析。他是以诗读《诗》而非以经读《诗》，故而有许多独得之见。

本书《诗经》原文采用中华书局影印的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全书305篇的次序，以仍其旧，删除了《雅》、《颂》部分古代基本上以每十首诗为一单元的“某某之什”（如“《鹿鸣》之什”）的单元目次，同时也删除了《小雅》中六篇有目无诗的笙歌。至于《毛诗序》、《郑谱》，我们只作为古今《诗经》研究成果之一来对待，仅作参考，不再录入。

对《诗》义的理解，广泛参阅古今有关注释、翻译的著作及研究成果，择善而从，也参照《诗义稽考》中比较合理的解释。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尽量从简（有些地方注明来源），不作繁琐考证，有些较难的字

作了注音。至于采用的古今研究成果，也不一一注明，在这里向《诗经》研究界的前哲、时贤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于译文，我们更感到万分艰难——任何翻译，包括古今汉语的对译，都不能完全把原文的内蕴表达出来，诗歌的翻译就更难。对《诗经》这部古代经典的翻译，许多研究大家都作过尝试，我们的尝试也遗憾多多，只能有待来哲。

评论部分的本意是想帮助读者对原诗的内涵有较为明晰的理解，同时也想对《诗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有所交代，所以，在对《诗》义理解的基础上，我们也把后世受其影响的例证略举一二，有些是古人的体会，有些是我们自己的理解。

尽管我们想尽量回归《诗经》文本的历史情境，注释、翻译和评论尽力做到情理合宜，但是任何一部古老经典，都深藏着许多的远古秘密，都是永远解释不完的，我们的解释也只是一种尝试。其中错误也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恳请方家赐教。

刘毓庆

2010年10月



总 目

前 言	1
诗经上 · 国风	
周南	1
召南	30
邶风	61
鄘风	115
卫风	144
王风	175
郑风	196
齐风	239
魏风	262
唐风	280
秦风	306
陈风	328
桧风	344
曹风	352
豳风	362
诗经下 · 雅	
小雅	391

大雅	643
颂		
周颂	809
鲁颂	857
商颂	882



诗经上

国风目录

前言	1
周南		1
关雎	2
葛覃	5
卷耳	8
樛木	12
螽斯	14
桃夭	17
兔罝	19
芣苢	20
汉广	23
汝坟	25
麟之趾	28
召南		30
鹊巢	30
采繁	32
草虫	34
采蘋	37

甘棠	39
行露	41
羔羊	44
殷其雷	46
摽有梅	48
小星	51
江有汜	53
野有死麋	55
何彼襋矣	57
驺虞	59
邶风	61
柏舟	62
绿衣	66
燕燕	68
日月	71
终风	74
击鼓	77
凯风	80
雄雉	82
匏有苦叶	85
谷风	88
式微	94
旄丘	95
简兮	97
泉水	100
北门	104
北风	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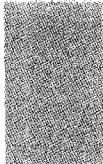
静女	108
新台	110
二子乘舟	113
鄘风	115
柏舟	115
墙有茨	118
君子偕老	120
桑中	125
鹑之奔奔	129
定之方中	130
蝜蝂	133
相鼠	136
干旄	137
载驰	139
卫风	144
淇奥	144
考槃	148
硕人	150
氓	155
竹竿	163
芄兰	165
河广	167
伯兮	168
有狐	171
木瓜	172
王风	175
黍离	175

君子于役	178
君子阳阳	180
扬之水	182
中谷有雍	184
兔爰	186
葛藟	188
采葛	190
大车	192
丘中有麻	194
郑风	196
缁衣	196
将仲子	198
叔于田	201
大叔于田	203
清人	207
羔裘	208
遵大路	210
女曰鸡鸣	211
有女同车	214
山有扶苏	215
萚兮	217
狡童	219
褰裳	221
丰	222
东门之墠	224
风雨	226
子衿	228

扬之水	230
出其东门	231
野有蔓草	233
溱洧	235
齐风	239
鸡鸣	239
还	241
著	242
东方之日	244
东方未明	245
南山	248
甫田	251
卢令	253
敝笱	254
载驱	256
猗嗟	258
魏风	262
葛屦	262
汾沮洳	264
园有桃	266
陟岵	269
十亩之间	271
伐檀	273
硕鼠	276
唐风	280
蟋蟀	280
山有枢	283

扬之水	286
椒聊	288
绸缪	290
杕杜	292
羔裘	294
鵲羽	295
无衣	298
有杕之杜	299
葛生	300
采苓	303
秦风	306
车邻	306
驷驖	308
小戎	310
蒹葭	314
终南	317
黄鸟	319
晨风	322
无衣	324
渭阳	325
权舆	327
陈风	328
宛丘	328
东门之枌	330
衡门	332
东门之池	333
东门之杨	334

墓门	335
防有鹊巢	337
月出	338
株林	340
泽陂	342
桧风	344
羔裘	344
素冠	346
隰有苌楚	347
匪风	349
曹风	352
蜉蝣	352
候人	354
鸤鸠	356
下泉	359
幽风	362
七月	362
鵲巢	373
东山	377
破斧	382
伐柯	384
九罭	385
狼跋	387



国 风

周 南

关于《诗经》中“周南”、“召南”的命名，一直是《诗经》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历来有“南音说”、“南化说”、“地域说”、“国名说”、“曲调说”、“南面说”、“诗体说”、“南风说”、“乐器说”、“职位说”、“舞蹈说”等等。《吕氏春秋·音初篇》言：“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行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这是关于“南”的最早解释，也是最为通达的一种解释。“南土”的地域相当于今之陕西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广大地区。流行于这些地区的音乐，便是所谓的“南音”。周公采回的部分称作“周南”，召公采回的部分便被称作“召南”了。但从现存的《周南》十一篇中，我们并看不出它与周公的关系来。就其时代而言，也没有一篇可证明是周公时的作品。相反可证明为春秋之作的倒有几篇（参看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据此，《周南》当是采用周公从南方带回的乐调而演唱的歌曲，具体作品并不一定都产生在南方。有些诗篇可能是采用了原歌的句子作为起兴，有些则是对原作作了修改。其演变的过程是复杂的，就像现在的东方歌舞团的音乐家创作的非洲歌曲，其风格听起来，黑非洲的风味十足；汉族作曲家根据维吾尔族民歌创作的歌曲，也具有维族特点。孔子说“《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而结尾有“乱”是南方音乐的特点，足以证

明其风格是南方的。因此，也就不能拘泥于《周南》中的某些地名、水名，对“周南”的产生地域或时间作出别的解释。比如，我们不能因为屈原作品有《河伯》，而“河”在古籍中一般指黄河，就说屈原是北方作家。

关雎

关关雎鸠^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②，
君子好逑^③。

参差荇菜^④，
左右流之^⑤。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⑥。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⑦。
悠哉悠哉^⑧，
辗转反侧^⑨！

参差荇菜，
左右采之^⑩。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⑪。

关关鸣叫着的雎鸠，
峙立在河中的小洲。
高贵娴雅的姑娘啊，
真是君子的好配偶。

长长短短的荇菜，
左边右边来寻求。
高贵娴雅的姑娘啊，
梦中也在把她追求。

追求她得不到回应，
思念的心日夜难宁。
情思的痛苦是这般悠长，
让我翻来覆去难以入梦！

长长短短的荇菜，
左采右采忙个不停。
高贵娴雅的姑娘啊，
美妙的琴声才让她动情。

参差荇菜，长长短短的荇菜，
左右芼之^⑯。做成菜羹祭祀神灵。
窈窕淑女，高贵娴雅的姑娘啊。
钟鼓乐之！快乐的钟鼓为她齐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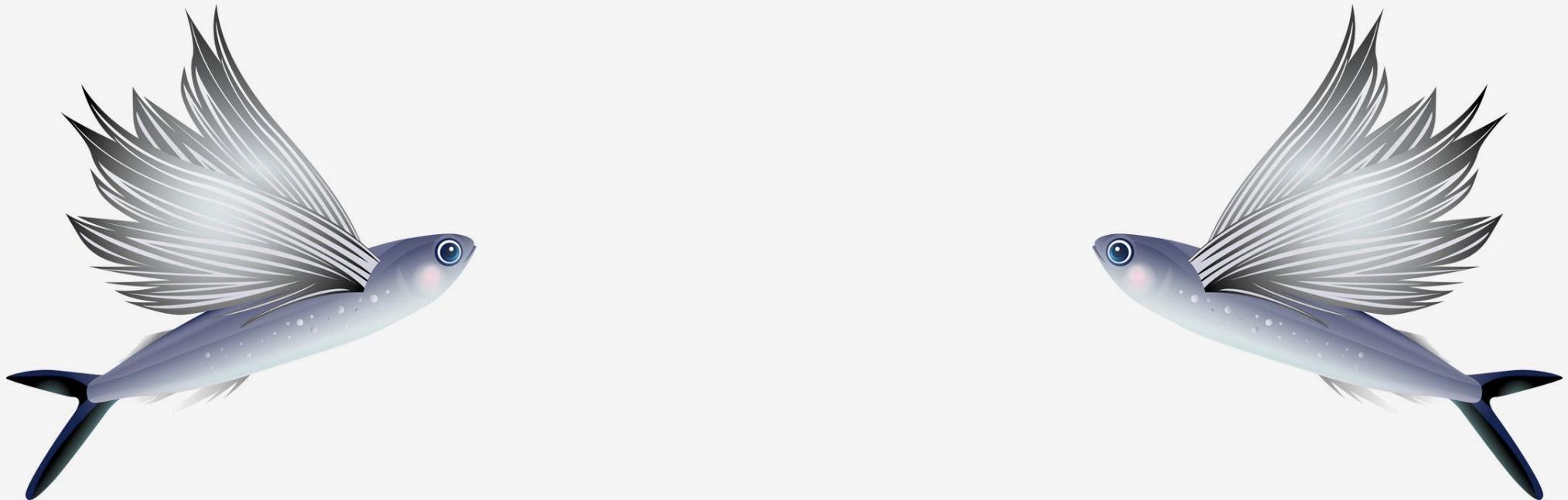
【注释】

- ①关关：水鸟雎鸠的叫声。
- ②窈窕淑女：犹言“大家闺秀”，后来“窈窕”引申为美好之貌。一说形容身材苗条。窈窕，形容居处幽深之状。
- ③好逑：佳偶。逑，配偶。
- ④参差（cēn cī）：长短不齐。荇（xìng）菜：多年水生植物，叶圆形，叶背紫色，略出水面。
- ⑤流：“擷”的借字，寻求。一说指荇菜随水流摇摆貌。
- ⑥寤寐：如作偏义复合词，即言睡梦中。寤，醒着。寐，睡着。
- ⑦思服：思念。为先秦周代的习惯用语。
- ⑧悠：长远，长久。此指忧思不绝。
- ⑨辗转：字从“车”，原指车轮的转动，这里指睡不着觉，身体在床上来回翻动。反侧：俯卧称“反”，侧卧称“侧”。
- ⑩采：手摘取物。这里指采摘荇菜。《诗经》中多处说到“采”，一般是隐含寻求、追求之意。
- ⑪琴瑟：古代弦乐器。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或二十弦。友：友爱，亲近。汉代司马相如以琴曲挑动卓文君，即此类行为。
- ⑫芼（mào）：菜，此处指以荇菜为菜以祭祀。或释为“择”，或以为“拔取”，或以为用荇菜覆盖鱼，来祭祀神灵，乞求婚后如意生子。

【评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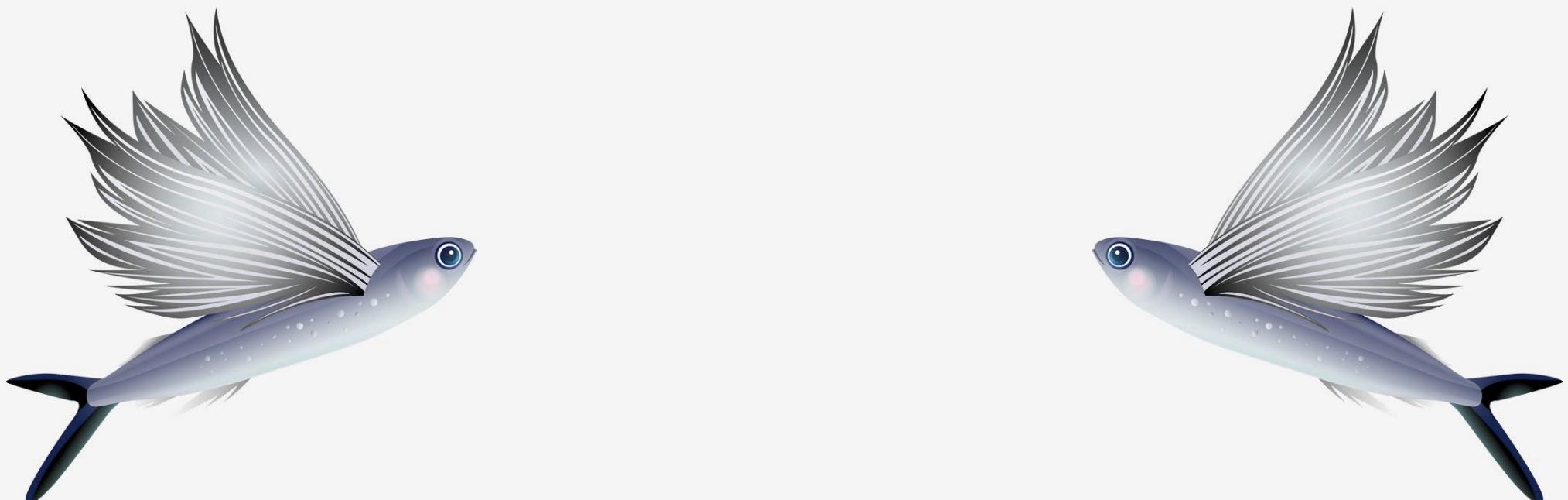
这是一首婚礼的祝颂之歌。但实际所写却是追求爱情的痛苦过程，表现了追求者因沉浸于爱的痛苦所产生的如梦如幻的美好情境。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这首婚礼歌，其流风余韵至今还鲜活地流布于民间。如湖北一些地方至今结婚时还唱“关关雎鸠一块屏，在河之洲两个人。巧言令色真好看，君子好逑做夫人”之类歌子。

全诗按内容和韵律可分为五章。第一章写诗人听到从河心岛上传来阵阵雎鸠的叫声，拨动了他青春情感的琴弦，于是想起了那位被隔离于绿洲上的姑娘。

鸟鸣，绿洲，河水，碧波，这本来就是一幅和谐明媚的图景。在这声色俱备的画面中，忽然走入一位窈窕善良的姑娘，为这幅图画注入了多少灵动之气！这窈窕的姑娘不但是这幅图画的亮点，也是全诗情感发展（情感逻辑）的起点，是全诗的中心。

但是，这一篇诗的前后两句为什么会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呢？这需要了解一下有关背景。

“雎鸠”，是一种捕鱼的水鸟，又叫鱼鹰，说到它，必然想到求鱼、捕鱼；而鱼在《诗经》中则是情侣的象征（这种象征来自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

“河洲”是一个青年婚前隔离教育的地方。上古时男女到了结婚的年龄，要接受婚前教育。在这一时期内（至少是三月），男女要实行严格的隔离制度。女性一般是被隔离于水中的高地（河心岛），或两水交汇之处，利用险阻的自然条件，便于隔离期的管理。这个制度，后来发展为《周礼》之所以谓“阴礼”。在隔离期，男子对他喜爱的女子，就只能无可奈何地隔水相望。

明白了以上的文化内涵，我们就很自然地懂得了这首诗的第一章所描述的事件是那么自然——关雎求鱼，象征着“君子”追求“淑女”；在那有河心岛的水边，发生过多少“君子”和“淑女”的浪漫故事！

面对明媚的自然景色，诗人并没有我们今天这般感受，他所关注的只是河心岛上的姑娘。但是自然景物与他所关注的“人”联系起来，也就自然地产生了“爱屋及乌”的联想。后世山水成为审美的对象，原因